

杨序

言近世战史者，断代于拿破仑，近代兵学亦以拿翁战史之研究肇其初基。拿翁用兵之神，武功之盛，远迈前人，顾于战争原则之理论说明，则初无体系，是亦犹大艺术家于着笔之际，原无规矩准绳存乎其心，故亦未能以体系完整之学说传其心法也。拿翁歿后，西洋对兵学之系统研究始渐盛，论者辈出，其尤著者，曰萧米尼，曰克劳塞维慈。萧米尼以瑞士籍军官曾充法军参谋，于拿翁作战之方法领悟特深，著有革命战争批判史，战术论等书，其对内线作战之阐扬，支配西洋兵学思想几达一世纪之久；惟萧米尼之立论纯出发于几何学的归纳与演绎，重形式而忽于精神，是其弱点。与萧米尼相反而相成者，则为普鲁士之克劳塞维慈。

克劳塞维慈生当拿翁之时代，且一度为法军所俘，羁法京三截，其对拿破仑战争之特质，观察当甚深刻，而克氏复秉哲学家之气质，承其本国哲学名宿康德，裴希特，黑格尔诸氏之余绪，治学方法慎密谨严，宜其学说博大精微，体系井然也。

克氏战争论之主要命题，约而言之，不外三者：一曰，政治目的为战争之本原动机，故战争实为政治之手段，政治活动之继续（战争之政治内容）；一曰，战争所用暴力有敌我间相互之作用，故暴力之发挥以达极限为理想（战略之独立发展）；一曰，精神力为遂行战争之要素，仅据物质现象立说则理论必与实际相违。凡此命题皆为拿破仑时代现实背景之产物，固不待言；拿翁一生成败，当时法兰西之政治新生，西班牙之游击战以及普鲁士之民军均与克氏以甚深印象，亦意中事，克氏于其书中已屡言之矣。拿翁以本能之直觉，运用极限暴力原则，故得成其歼灭战与速决战之大功；善用士气，故能克服诸多危难，行动敏速；惟自一八一二年之役以后，战功之赫赫如故，而政治目的之达成则鲜，终以覆败。拿翁以直觉所行之于实践者，克氏则以哲学规之为学理，于是有战争论之作。普鲁士军人读克氏书，试用之一八七零年之战，赖政略战略之协调，极限暴力原则之运用，果奏捷于色当，尽雪前耻。克氏之学说行，德意志黠武主义之思想遂亦因克氏极限暴力说之刺激，而渐猖獗矣。

然而克氏战争学说之精义，主在说明战争之政治内容，固非以暴力之极限使用为目的也。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败于协约国家，政略上之原因居多。鲁登道夫于战争后期以幕僚首长负战争指导之主责，其对政略与战略之不尽配合引为痛心，事属固然，第政略与战略不尽配合之原因，果否必当归咎于克氏战争学说之政治命题，则诚为疑问。战争爆发当时，德国参谋总长小毛奇之以动员计划已定，无可更易为辞，致令德国不得不冒两面作战之危险，是其战略早经独立发展，控制政略，胜败之数固无待于美国之参战与否也。鲁登道夫以第一次大战之经验着为全体性战争论，为本次大战轴心国家之精神的作战指导，就政治目的、极限暴力以及精神要素诸原则言，全体性战争论实仍祖述克氏，然必欲以政略屈从战略，发挥黷武主义之精神至于极限，则本次大战德日两大军国之崩溃，可以为鉴矣。

克氏为学，以理论与现实并重，合哲学的思索与战史之研究为统一的发展，其方法论之正确，即在百年后之今日亦具无可否定之价值。克氏之言曰：『战争发原于社会诸条件及其相互间之关系，故亦受此等条件之支配，』其对战争之动的本质，殆已说明无遗；然则其战争理论亦当依时代关系而为动的统一，实为当然。百余年来科学技术之进步，克氏固不及见，即社会条件与政治理想之改观，亦颇非普鲁士精神萌芽时代之克氏所可豫知；故现代战争之指导应如何依从新的社会条件以求新的政治理想之实现，是亦非克氏所可得而言者。日本成田赖武取克氏之书，汰其陈旧，删其繁冗，期合于时代之要求，用意至善；惟苟摈弃克氏之方法论于不顾，而徒以克氏之若干命题，视为黷武主义经典，是则重违吾人研究克氏之本意矣。

友人李浴日先生夙治孙子，蜚声论坛，兹复译成田氏之书，知余于克氏学说之介绍不无些微因缘，乞为之序，爰书所见如此。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中山杨言昌